

走向大国内生性需求拉动 为主的增长格局*

——对中国贸易顺差现象的研究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 刘 鹤

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中国出现了外部和内部经济的双向失衡问题。中国经济的外部失衡是内部经济阶段性失衡的集中体现。内部失衡主要表现为储蓄率过高而消费率过低,过高的储蓄率和不断降低的消费率使高储蓄和高投资形成循环,剩余的生产能力走向国际市场。因此,降低储蓄率,调整投资结构,提高消费率,进而促进国际收支平衡,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战略所追求的基本目标,也是中国在失衡的国际经济背景下实现和平发展的理性选择。为了实现由国际大循环向大国内需拉动为主思路的战略转变,必须加快改革和调整发展战略。

一、背景、影响和基本原因

1. 在本轮经济上升的周期中,中国经济最鲜明的特征是贸易顺差大幅度跃升和外汇储备急剧增加。2004 年中国贸易顺差为 321 亿美元,外汇储备为 6099 亿美元。2005 年中国贸易顺差为 1020 亿美元,外汇储备为 8189 亿美元。2006 年中国贸易顺差为 1775 亿美元,外汇储备为 10 663 亿美元。与此同时,外贸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分别达到 60%、64% 和 66%。这在大国经济发展历史上是绝无先例的。

2. 从全球经济看,中国外贸总额大量增加,为全球经济提供了大量低价工业制成品,平抑了世界的总物价水平。中国的发展,拉动初级产品经济回升,推动全球资本流动,加速世界经济重组,其增长效应之大是前所未有的。从国内经济增长看,出口的拉动缓解了国内劳动力和产品供给双过剩的突出矛盾,加速了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步伐,提高了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极大提高了中国经济供给的地位。

3. 中国外贸顺差以几何级数增长、外汇储备大幅度跃升,至少造成了两个直接负面影响:第一,加剧了国内宏观经济的压力,使流动性过剩的矛盾日益突出。据有关部门估计,从 2003 年开始出现国内流动性过剩,主要是由于国际收支大量顺差造成的。2003~2006 年的 4 年间,中央银行累计购汇约 7800 亿美元,释放出 64 000 亿元人民币流动性,这无疑使经济趋热和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第二,加剧了我国与主要贸易国的矛盾。我国与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摩擦明显上升,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关系处于既有合作又有竞争的状态,中国经济增长在全球引起的再分配效应引起争议,国际社会期

* 本文完成于 2007 年 4 月 9 日。

盼的是给日益缩小的全球市场带来巨大新空间的中国经济,但不少国家感受到市场相对份额变得更小。因此,对中国与本国经济关系的不确定性和由此产生的焦虑在扩大。

4. 中国贸易顺差不断扩大,首先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出现的。由于比较优势的变化,跨国公司加速调整全球布局,资本开始寻找更好的投资环境,互联网的发展则为全球生产力配置提供精确而全方位的技术支撑。在这个过程中,大国的相对地位正在变化。美国作为世界金融和贸易中心的地位加强,但制造业的地位相对弱化,日本和德国装备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继续提高,但劳动密集产业大量转移,一些新兴初级产品供给国的贸易条件改善,但产业结构单一化现象加剧,中国成为新的世界生产基地对各个国家具有巨大的投资吸引力。在本轮经济周期中,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大部分形成的生产能力转化为出口,初步统计,加工贸易形成的外贸顺差超过中国贸易顺差的 50% 以上。中国国内正经历由人均收入从 2000 美元向 10 000 美元阶段跃升的历史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大量农业劳动人口转向城市,加入到工业化的进程。这恰恰为国际资本流动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

5. 国际化和全球化仅是外部因素,更为重要的是国民总储蓄和总消费结构出现变化。总储蓄率由 2000 年的 37.7% 上升为 2005 年的 48.1%,最终消费率由 62.3% 下降为 51.9%,下降了 10.4 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总储蓄结构和总消费结构都在出现新特点。从国民经济宏观账户关系来看,国民总储蓄率减掉国内资本形成率后,恰为贸易顺差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6. 进口与投资的函数关系发生转变。经典理论中投资与进口正相关性关系不复存在。这就像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出现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的情况时一样令人费解,但实际情

况就是如此。1998~2005 年,投资与进口的关系发生逆转,净出口数量的增加与投资增加正相关,相关系数高达 0.71,投资与进口出现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 -0.67。随着技术进步和国际生产能力转移,国内供给体系从总量和结构意义上基本具备对主要投资品的进口替代已经初步完成。

综上所述,国内储蓄过剩和消费需求不足,是中国贸易顺差扩大的国内条件,而大国国际收支和国内收支失衡、国际分工调整步伐加快是中国贸易顺差得以在国际市场实现的外部条件。高储蓄为高投资提供来源和压力,而国内总消费率下降,使国内市场难以全部消化高投资形成的巨大生产能力,造成较多的出口,进口替代能力增强使进口量相对下降,这一过程所形成的贸易顺差和与此派生的资本净流入又转换成更多的宏观经济流动性,为投资扩张提供着更多的、漫出库坝的“水源”,从而出现高储蓄、高投资、高出口、高顺差的放大性往复循环。

这个循环的形成,显然具有国际和国内、历史和现实的必然性,立即中断这个循环在经济上是不可行的,如大幅度调整汇率。这是因为,这不但意味着中国经济将陷入失业和生产能力过剩并存的“凯恩斯状态”,也意味着全球经济的风险,如果没有中国低价的大量产品供给,后续国家生产能力在短期内又难以补充,将会使全球物价指数大幅上扬,其他国家的消费者也将蒙受较大的损失,这反过来又会对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甚至引起世界经济的衰退。但这个循环的可持续性正在受到四个长期条件变化的制约:(1) 中国劳动力成本的变化。目前中国普通劳动力的成本正以每年 10% 的速度上升,人口结构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如果中国经济保持正常较快的增长速度且汇率稳步升值,按目前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测算,到 2020 年中国人均 GDP 的水平有可能达到 8000 美元左右,这

意味着中国出口相对比较优势将发生较大变化。(2)中国作为新的世界生产制造中心所必须支付的资源和生态环境代价。这方面承受的压力在明显加大。目前议论较多的是能源和土地问题,但最实质的问题是淡水资源的制约。中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为 2150 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28%,从长期来看,这是难以支撑全球制造中心地位的。(3)国内社会心理对总储蓄与总消费失衡及其分配效果的承受能力。这是我国非经济性对经济因素的重要制衡。作为一个经济转轨国家,在体制不定型和价值观念走向多样化的特定历史阶段,非经济因素和非理性选择对经济因素所产生的影响之大通常是出乎意料的。目前发展的趋势是,社会心理的承受能力似乎逐步接近天花板。(4)国际经济失衡的可持续性。这既包括支撑这个贸易环流得以持续的多种因素中的任何一个因素的突然变化,包括直接受益者和受损者之间的利益平衡,也包括对这个环流产生的全球性增长和分配效果作出政治性评价的经济民族主义声音。可以看到的是,这个声音越来越大。

不难看出,这些长期约束条件都在逐步走向强化,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模式已经到了一个反思时刻,需要从全球战略视野和国内约束条件的变化主动地进行适应性调整。第一,这个调整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是必要的。第二,这个调整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以完成,但是任其继续下去可能是比较困难的。第三,这个调整应该是与其他大国互动式的调整,但调整的重点是自己调整自己。

二、国民总储蓄和总消费

逐步降低国民总储蓄率和相应提高消费率是减少中国贸易顺差的逻辑起点。在中国目前的城市化、工业化加速历史阶段,仅就消费能力谈消费扩大是没有意义的。这几年讨论的结果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关键的问题是怎样在储蓄转

化为投资的过程中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消费能力,在提高投资效率的前提下使过度扩张的投资行为得到合理的约束,这才是降低国内总储蓄率的基本立足点。当然,分析还要从国内总储蓄率及其结构开始。

本轮经济周期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国民总储蓄率的大幅度上升。2005 年中国国民总储蓄率达到 48.1%,与 2001 年作为周期起点的年份相比,提高了 8.5 个百分点,同期国内总消费率也下降到历史低点,贸易顺差从 300 多亿美元第一次突破千亿美元,成为国内“超额储蓄”的外在标志。这种情况在中国经济发展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如此之高的国民储蓄率在大国经济发展历史上也是少有的。

深入分析国民总储蓄结构,发现居民储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 2001 年的 18.2% 下降到 2005 年 16.8%,下降了 1.4 个百分点,企业储蓄所占比重由 13.3% 上升到 20%,提高了 6.7 个百分点,政府储蓄由 7.1% 上升到 11.2%,增加了 4.1 个百分点。在 5 年时间之内,政府和企业的储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共上升了 9.4 个百分点。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发生这么大的变动,显然需要进行冷静的分析。特别需要看到,一个国家的总储蓄率是相对稳定的经济参数,尽管高储蓄是亚洲国家的重要经济特点,但发生如此之大的变化,是绝无仅有的(详见表 1)。

为什么政府和企业的储蓄会出现较大幅度的跃升?这是本轮经济周期处于上升阶段所派生的现象,或者说,是高储蓄、高投资、高出口自我循环的派生结果。原来水平就较高的国民储蓄率在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下转化为高投资,高投资带来了典型的速度型经济效益,使企业的投资回报率达到历史高点,企业回报的一部分转化为政府的高税收。在企业利润倾向投资和政府支出也倾向投资的背景下,两者的高储蓄形成

表 1

中国国民总储蓄率的变化

| 年份 | 国民储蓄率(%) | 各部门储蓄所占比重(%) | | |
|------|----------|--------------|------|------|
| | | 居民 | 政府 | 企业 |
| 2001 | 38.6 | 41.6 | 19.5 | 39.0 |
| 2002 | 40.4 | 46.4 | 18.0 | 35.7 |
| 2003 | 43.2 | 42.2 | 21.7 | 36.1 |
| 2004 | 45.7 | 38.9 | 21.8 | 39.4 |
| 2005 | 48.1 | 36.9 | 23.6 | 39.6 |

资料来源:2000~2003 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4~2005 年为推算值:①各部门可支配收入增速分别用居民实际收入增速、政府财政收入增速、工业企业利润增速(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替代,计算得出各部门收入;②假设 2004 年、2005 年居民和政府的边际储蓄倾向变化与 2001~2003 年平均值相同,企业边际储蓄倾向不变;③企业可支配收入等于企业储蓄。

更高的投资率,相对于日益下降的国内消费水平而言,必然走向国际市场,产生大量的贸易顺差。从某种意义上说,一旦中国经济出现周期性的波动,超高的储蓄率可能会恢复到原来的水平,虽然不会比基期的起点水平降低很多。

这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企业和政府的高储蓄必然转化为高投资,而没有更多地转化为消费?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第一,在中国经济增长加速的阶段,特别是城市化进程加速的阶段,投资的回报率很高。据有关方面测算,目前投资的毛回报率约为 20% 左右,净回报率约为 10% 左右。第二,投资是在基础经济变量扭曲的情况下发生的,初级产品的价格并没有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没有计入企业的内部成本,汇率相对于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存在低估现象,这使得企业的内部成本远低于社会成本。第三,政府行为存在错位。税收并没有成为宏观经济的稳定器,反而成为政府投资扩大的来源,这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事权不对称和财税体制改革不到位有直接关系。第四,在目前的发展阶段和体制机制条件下,第二产业中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特别是垄断行业的资本回报率明显高于服务业。据有关方面测算,在本轮经济周期中,第二产业的毛回报率高于 30%,而服务业的回报率不足 10%,两者之间的差异还在扩大。

第五,相对于资本而言,劳动者特别是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中的劳动者在工资谈判方面处于供求的劣势地位。劳动力总量过剩使得劳动者的工资参照系还处于“刘易斯二元结构状态”,卢卡斯描述的人力资本稀缺现象还比较严重。虽然在某些产业和局部地区出现了人力资本的相对短缺,但这还很难作出劳动力供求总格局已出现拐点的判断。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逐步降低政府和企业储蓄率要同时满足四个条件:第一,要逐步解决基础经济变量的扭曲问题,使企业的外部成本内部化。第二,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在制度设计特别是财税体制上,减少一些层级地方政府对制造业的冲动,并使之获得履行公共职能的资金来源。第三,投资方向要逐步从贸易产品转向非贸易产品,提高服务业投资的比重,也就是说要提高服务业的投资回报率。第四,投资要有利于扩大劳动者就业和使劳动者获得更多利润份额的中小企业。

按照这样的条件,把目前超高储蓄率降下来的命题,就成为本轮经济周期宏观经济管理和提高投资效率的命题。目前有些经济学家提出对企业加征资源税和收回国有产权收益的建议,目的是为了减少企业的投资冲动。这是正确的,但不是问题的本质,因为加税可能对少数垄断行业

的投资成本产生影响,但并不能改变政府行为。税收之所以没有成为宏观经济的稳定器,反而成了放大器,最根本的原因是政府职能的定位存在重大的缺陷。相当多的政府行为类似于企业行为,具有很强的投资冲动,这一点需要从目前的财税体制中找到答案。

另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是企业的储蓄。企业留利的相当部分没有用于分配,而是倾向于储蓄起来用于高回报的投资,需要看到,目前企业总的盈利水平比较高,但实际高盈利水平的企业集中在少数垄断行业,相当多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平均回报的水平低于10%。中小企业发展滞后的问题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微观问题,而成为制约总储蓄与总消费失衡的重要环节。

最重要的仍然是居民的储蓄行为,虽然居民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和居民储蓄占国内总储蓄的比重稳步下降,但居民的边际储蓄倾向却在稳步上升。在银行的存款中,居民储蓄所占比重由46%上升为49%,提高了3个百分点。在居民就业和收入来源多元化和社会保障体制加快建设的背景下,居民边际储蓄倾向的上升仍然是我们需要认真分析的最重要线索。从目前已经掌握的资料来看,引起居民边际储蓄上升的原因至少有两点:第一,为未来储蓄的动机非常强烈,特别是中青年社会群体的边际储蓄率大幅度上升。这既表明了对未来子女支出成本上升的强烈预期,也暗示着目前社保体系的激励不足。第二,对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这表明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和产业结构调整方向与自身能力适应性之间的犹豫。这种状况主要在受教育程度较低和专业不强的社会群体中有突出表现。反映这一倾向的主要数据支持是农业人口边际储蓄率的上升。

与总储蓄对应的是总消费的状况。在收入

水平和为未来的变化存钱这两个条件给定之后,真实的货币消费能力转化为现实的消费受到两个方面情况的影响:一是居民收入分配结构的状况,二是供给体系满足消费的便利化程度,这两个方面都存在着使消费进一步减少的制约条件。中等收入者比重偏低是使消费支出总量减少的重要原因。到2006年,我国中等收入者比重仅占19%,虽然这一比重以每年2个~3个百分点的速度增加,但整个社会尚未形成橄榄形的分配结构。值得重视的是,我们的目光似乎偏离了主线,对中等收入者阶层这个重要命题的研究非常有限。另一方面,虽然总消费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持续下降,但由于收入分配结构存在的差异,中等收入者收入的增长速度实际快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速度,他们的消费需求已经大大超越温饱阶段,大批量生产和单一化的消费模式无法适应这个新阶层多元化的消费需要,而这个新需要存在拉动就业进而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的巨大潜力,但国内供给体系的跟进速度包括服务业的发展、教育制度的调整 and 企业的商业模式都难以适应新需要,可能形成的新产业在供求链条上存在着明显的断痕。关于这一点,可以通过直观的国际比较而不必用统计数据加以证明。

三、结构性改革的方向和前景展望

前两部分分析的基本结论是一个复合函数的关系式。国际贸易的高顺差是国内高储蓄率的结果。在国内的总储蓄中,政府和企业的高储蓄进而高投资行为是经济变量扭曲和财税体制改革不到位的结果,个人高储蓄率是对未来支出预期不确定的结果,在既定消费能力下产生的“无奈储蓄现象”又是供给结构刚性和中等收入者比重偏低的结果。因此,对中国经济出现的结构性不平衡可以提出三类基本的政策取向。第一,在短期内,加快调整和校正基本经济变量的

扭曲,以缓解国际收支带来的种种压力。第二,在中期内,加快推进财税体制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以改变政府的投资行为和个人的储蓄行为。第三,在长期内,加快城市化的步伐,发展服务业,调整教育结构,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创造和扩大中等收入者阶层。按照这样的政策安排,逐步使中国经济过度依赖出口的局面转向大国内需拉动为主的局面。

1. 短期政策。短期政策的目标是减顺差、调投资和促消费,其被称为短期政策主要有两点内涵:可以直接使用的政策工具和体制不变。其逻辑和操作顺序包括:以减顺差为目标的汇率稳步小幅升值,比如每年升值5%;改变“奖出限入”的进出口关税结构,如降低出口退税率、降低进口关税和取消进口许可制,建立进口补贴和融资制度,引导外资流向和加快国内资本的外流等;以调投资为目标提高存贷款利率和准备金率,如目前可将存、贷款利率各提高0.25个百分点,将准备金率提高到12%左右;适时加快出台燃油税;调整水价和电价,对企业征收合理的环境保护税,使外部成本内部化。以食品安全整治和整顿市场秩序为重点促进居民正常消费,研究和制定符合中国国情、尊重市场规律、满足消费多元化需求的切实可行的房地产产业政策。

2. 中期政策。中期政策的目标是改变居民的储蓄预期和合理约束政府的投资冲动,加快政策转变职能。其被称为中期政策的原因在于,要通过政策的精心设计和工程化计算实现改变预期和转变行为的意图。主要内容有两点:第一,对养老体系进行再设计,使之具有统一性、公信力和可持续性。按照中央政府低水平广覆盖统筹、个人和企业共同建立个人账户(具体方法从实际出发)和个人有选择的商业补

充三根支柱的思路加快整合目前的养老保险体系,相应加快发展债市与股市相协调和金融产品多样化的支撑体系,使个人储蓄率下降,使国民总储蓄率逐步稳定在30%~35%的水平上。第二,稳步推进使中央、地方事权划分合理的公共财税体制改革。提高中央政府对社保体系的支出集中度和规范转移支付体系,加大地方政府对义务教育、改善投资环境的事权,调整增值税分配方式和将服务业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或将服务业税收划归地方),开征物业税,重构中央和地方税源体系,使地方政府在较大减少投资冲动的前提下具备履行事权和提供公共服务的充足财源。

3. 长期政策。长期政策指的是实现向内需拉动为主进行结构转型的发展战略,其政策目标是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实现途径是稳步推进城市化和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但这并不排斥对外贸易的重要作用),同时适应性地调整产业结构和区域经济发展布局,逐步实现动态均衡。长期政策的内容十分明确,是需要经过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可以实现的目标,譬如,到2020年国内消费率达到65%~70%,城市化率达到60%~65%,中等收入者比重超过55%,或者达到更高的水平,服务业比重超过50%等。核心问题有两点:一是以大城市合理布局和加快发展为基本内容的城市化政策设计,这涉及农业政策、土地政策、人口管理政策和市级政府事权等争议很大但又关系全局的重大政策讨论。二是教育改革,包括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教育内容的大幅度调整和更新、高考制度改革和教师激励问题,也包括如何建立适应中国经济体制和结构特点的公立和民办办学并存的立体、开放、现代的教育系统,这方面的讨论空间还很大。■